

宋敏求的家世與史學

王 德 毅^{*}

提 要

宋代史學極盛，史家眾多，其能父子前後相繼修國史及實錄者，在北宋只有常山宋綬、敏求父子，如同漢之司馬談、遷，為當時士大夫所稱羨。

宋綬父名皋，娶宋初名儒楊徽之之獨生女，徽之家藏書甚富，死後全部贈給外孫宋綬。綬天資穎異而又好學，益增加藏書，官至參知政事，賜第京都春明坊，至敏求，歷三代經營，藏書已達三萬餘卷，外地士大夫喜讀書者，為便於借閱，多在春明坊或其附近賃屋以居，房舍租金竟較他處為高。

敏求自幼好古敏求，不以門第驕於人，而好賢下士，為歐陽修所稱。家中典藏唐代文獻最富，綬嘗編輯《唐大詔令集》，未及成而卒，敏求為之補訂分類，纂成一百三十卷。唐代諸帝之實錄自宣宗以下全缺，敏求為之補編。及仁宗詔修《唐書》，修書官王堯臣以敏求熟習唐代故實，乃薦之為編修官。後歐陽修專任刊修，亦常向敏求咨訪。英宗即位，詔修《仁宗實錄》，提舉實錄院韓琦薦敏求任編修官。神宗熙寧二年（1069），司馬光任史館修撰，欲修《皇朝百官公卿表》，推薦敏求為同修。至十年，詔修仁宗及英宗《兩朝國史》，由宰相吳充提舉，敏求任修國史，並兼宗正寺修玉牒官，先修成帝紀草進呈。元豐二年（1079）敏求病逝時，《百官公卿表》及《兩朝國史》尚未修成，而於兩年多後，先後成書，敏求家皆得到銀絹之賜。

敏求一生著作甚富，平日於朝章國典甚留意，奉詔編修《閣門儀注》、《蕃國朝貢條例》，編成《蕃夷朝貢錄》，詳定《元正朝賀儀注》，於典制多所規畫。又於地志亦留意，修成《東京記》、《長安志》、《河南志》，於漢唐及宋之京城皆有詳細的記述。又記平生當官所聞見，有《三川下官錄》、《入蕃錄》及《春明退朝錄》，均有功於當代文獻。此外又參與編修《續國朝會要》、《元豐九域志》，雖未克就，仍是有貢獻的。如此淵博的史學家，求之古今中外，實不易多見。

關鍵詞：家世 藏書 史學 國史 典制

^{*} 臺灣大學歷史學系名譽教授。

- 一、前言
- 二、宋敏求的家世與生平
- 三、史學貢獻
- 四、結論

一、前 言

自隋唐實行科舉制度以後，讀書人可以靠著自己的努力，「懷牒自列於州縣」，參加鄉貢考試。唐代科舉雖有十多種，惟士族所趨嚮者僅明經、進士二科，皆「縣考試，州長重覆」，試中者經州貢於禮部，再加以進退。凡得中科名者，就有機會走入仕途，不必再憑藉家庭背景而貴顯。¹降及宋代，士人勤讀經史，參加科舉考試，已是他們進取正途，當時的名臣、大儒，十之八九為進士起家的。在此一制度下，不僅可清除政治上的特權階級，使全國各地農村中的優秀份子得到參政機會，既可促進族群的團結，更可以提升全民的國家意識和政治認同。於吏治的革新，政局的穩定亦大有助益。²

在五代以前，讀書人平日所習讀經史，是靠輾轉借閱，親自鈔錄而始擁有的，所以一生勤苦力學，並不能大量藏書。但自五代後唐明宗時，宰相馮道「與同列李愚委學官田敏等，取西京鄭覃所刊石經，雕為印板，流布天下。」嘉惠後進至為廣遠。³逮至宋朝肇建，大興文教，太祖屢令文武大臣要多讀書講求治道，太宗也賦詩勸學，以勉士子。真宗以後，政治安定，百姓生活漸漸步入小康，讀書人與日俱增，典籍的需求量也隨著增加，國子監乃奉命校刻群經諸史分贈太學、府州學和書院，這是學術

1 參見杜佑，《通典》（大化書局影印清刻本），卷15，〈選舉典〉三；歐陽修等，《新唐書》（鼎文書局影印新校本），卷44，〈選舉志〉上。

2 參考錢穆，《國史大綱》（臺灣商務印書館出版）上冊，第24章第1目〈唐代貢舉制〉。

3 見薛居正，《舊五代史》（鼎文書局影印新校本），卷126，〈馮道傳〉。

振興的大好時代。《宋史·儒林傳》載真宗與國子祭酒邢昺的一段話：

（景德二年）夏，上幸國子監閱庫書，問昺：經板幾何？昺曰：「國初不及四千，今十餘萬，經傳、正義皆具。臣少從師業儒時，經具有疏者百無一二，蓋力不能傳寫。今板本大備，士庶家皆有之，斯乃儒者逢辰之幸也。」上喜曰：「國家尚儒術，非四方無事，何以及此！」⁴

邢昺生於後唐明宗長興三年（932），歷後晉、漢、周，全是亂世，他自少年從師習諸經時，所用讀本只有經文，沒有注疏，因為抄寫太費時費力了。到真宗景德二年（1005），時宋興已四十六年，國子監不斷刻書，不僅國家藏書大量增加，而士大夫家更喜歡藏書，影響所及，一般庶民期盼光耀門楣，開始聚書留給子孫習讀，有朝一日有賢子孫考中進士，出而就仕，也可以躋身新興的士大夫家庭之列。所以藏書風氣是普遍的，只是藏書的多寡而已。而藏書較多的士大夫，其子孫也多能承繼家風，成為文學或經史學之名家。據張邦基《墨莊漫錄》載：

藏書之富，如宋宣獻（綬）、畢文簡（士安）、王原叔（洙）、錢穆父（勰）、王仲至（欽臣）家，及荊南田氏（偉）、歷陽沈氏（立），各有書目。……京都盛時，貴人及賢宗室往往聚書，多至萬卷。⁵

這裡所提及宋宣獻（綬）即是敏求的父親，綬被封為燕國公。敏求則被尊稱為常山公，實和邯鄲李若谷、淑父子齊名，都是北宋最偉大的藏書家，各藏書不下三萬卷。尚有昭德晁氏，自晁迥至晁說之前後凡五代，也積累藏書達二萬多卷，且其每一代都號文學，各有專集，如喻汝礪在為晁沖之詩集撰之序文中稱道：「其家世風流、人物之美，淵淳而浚深，蓄厚而發遠。自王文獻（溥）、李文正（昉）、畢文簡（士安）、趙文定（安仁）四三公，富有百氏九流之書，而晁氏尤瓌富閎溢，所藏至二萬卷，故其子孫焯掌勵志，錯綜而藻續之，皆以文學顯名當世。」⁶古今

4 脫脫，《宋史》（鼎文書局影印新校本），卷431，〈邢昺傳〉。

5 張邦基，《墨莊漫錄》（四部叢刊續編本），卷5。

6 晁沖之，《晁具茨先生詩集》（叢書集成新編本），卷首。

典籍是青少年吸收舊學術新知識之泉源，有極強的吸引力，藏書家的子弟不會變壞，晁氏子孫喜好文學，而宋氏及李氏子孫則以史學見長。晁氏族系、李氏史學，早已有專文考述，今特對宋敏求的家世生平與史學加以研究，撰為此文，以與宋史學界的朋友共商之。

二、宋敏求的家世與生平

宋敏求字次道，趙州平棘人。平棘為漢代常山郡治所，故稱常山宋氏。宋氏，本子姓，乃商之後。周武王封微子啟於宋，傳國三十六代，為楚國所滅，其子孫遂以國為氏。⁷秦漢以後，代有名賢，宋代宋姓名臣莫過於宋庠、宋祁兄弟，在范鎮所撰的〈宋景文公祁神道碑〉中，也稱祁曰「常山宋氏」，並說：「其先周武王封微子於宋，因以為氏，望於廣平。」⁸是知宋敏求與宋祁乃是同宗。又據范鎮所撰的宋敏求墓銘，載其曾祖名龜符，曾任平棘令，以孫綬位至參知政事，追贈太師中書令。祖父名皋，太宗、真宗時官至尚書度支員外郎直集賢院，亦以子綬貴而得追贈太師中書令，封譙國公。⁹皋娶翰林侍讀學士楊徽之的獨生女，徽之是建州浦城人，於後周世宗時北上中原，試中顯德二年（955）進士，至宋，歷太祖、太宗至真宗，累掌文柄及諫職，又曾受詔編《文苑英華》，以詩文名於當世。皋子綬，即敏求之父，徽之的外孫，少而警敏聰慧，為徽之所喜愛，便把家中的藏書全部贈與之。這是宋敏求家富於典藏的根源。據蘇頌撰〈文莊楊公神道碑銘〉載：

公無子，一女，前夫人所生，一歲而失恃，繼夫人恭自鞠毓，逮於笄字，歷選良配，遂歸譙公（宋皋）。累封鄭國太夫人，賢明通書，治家有法，子即常山宣獻公也，公薨時，方十齡，而超異夙成，克

7 章定，《名賢氏族言行類稿》（四庫全書本），卷42。

8 杜大珪，《名臣碑傳琬琰集》（文海出版社影印舊鈔本）上集，卷7，〈宋景文公神道碑〉。

9 《名臣碑傳琬琰集》中集，卷16，〈宋諫議墓誌銘〉。

荷後事，圖書素業，一以付之。惟宣獻公以文章道德顯赫兩朝，佐佑仁皇，再登宰政，號令風采，為時宗工，雖德業所基本乎世間，而緒風克紹，抑自外門。¹⁰

宋綬自祖父以來已三世遊宦，家中自會不斷收藏典籍，但楊徽之所庋藏的必極珍貴。而這些珍籍，對宋綬畢生治學和從事修國史及編修前代史巨著，必大有幫助。綬娶宰相畢士安孫女，其子敏求又娶士安的曾孫女，而士安家亦富於典藏，兩家相互交換或互借抄錄，乃為極自然之事。根據晁說之所說：「宋宣獻家四世以名德相繼，而兼有畢丞相、楊文莊二家之書，其富蓋有王府不及者。」受到當時儒者的稱揚。¹¹陸友仁更進一步道出宋氏前後四代家風不衰之故。據云：

宋宣獻公綬，楊徽之外孫，徽之無子，盡付以家所藏。後與父臯同在館閣，每賜書必得二本。子敏求、敏修，並以文學見稱於世，其藏書之盛有以也！¹²

積累藏書必依代代賢子孫能讀書然後可，比積累財富還要難。古所謂富不過三代，藏書家則可達五代而不替，驗之宋氏，信乎不謬。前述宋氏至敏求已四代，至敏求之子慶曾便是五代，從畢仲游所撰的慶曾墓誌銘中，知慶曾能保有先代之書，也是卷不釋手的。且敏求娶仲游之長姊，是仲游為慶曾的舅父，可知兩家往還是極密切的。據墓銘云：

宋氏出於趙州之平棘，宣獻公以道德文章名天下，藏書萬餘卷，其所著述纂錄合七百餘卷。而公嗣常山公，亦著《平棘集》二十卷，《河南訪古錄》一卷，《先公故事》一卷，……其有家之遺風矣！元豐八年三月，哲宗皇帝即位，太皇太后垂簾共政，有司討論垂簾之儀未備，惟公家有其書，乃詔公上之。……宋氏自宣獻公以儒居位，凡郊丘朝祧、會朝禮文、官名制度，一皆出之手，至常山公益明習。而公繼兩人後，卷不釋手者三十年，亦多知古今沿革典故，

10 蘇頌，《蘇魏公文集》（青友出版社印本），卷51。

11 晁說之，《嵩山文集》（四部叢刊續編本），卷16，〈劉氏藏書記〉；晁公武，《郡齋讀書志》（四部叢刊續編本），前附自序。

12 陸友仁，《研北雜志》（叢書集成新編本），卷下。

公卿大夫疑于事，必咨公而後乃行。¹³

慶曾能讀家藏之書，所珍藏的歷代禮書和朝章國典，有實用價值。當仁宗即位時，以沖年難理國政，由章獻皇后垂簾稱制，未有故實，乃於宋綬家集禮官討論，最後由綬裁定。事隔六十多年，直到哲宗即位，宣仁皇太后垂簾，其典禮又由慶曾奏定，祖孫前後輝映，成儒林嘉話。自綬在仁宗朝官至參知政事，朝廷賜第春明坊，綬與子敏求、孫慶曾都喜校書，常說：「校書如掃塵，一面掃，一面生。」所以有的書校過三四遍，成為善本，受到愛讀書的人所重視，多往借閱，或者就在其家附近租屋寓居，以便於前往借閱。據朱弁《曲洧舊聞》載：

宋次道龍圖云：校書如掃塵，隨掃隨有。其家藏書皆校三五遍，世之蓄書以宋為善本。居春明坊，昭陵（仁宗）時，士大夫喜讀書者，多居其側，以便於借置故也。當時春明宅子比他處僦值高一倍。陳叔易（恬）常為予言此事，歎曰：「此風豈可復見耶！」¹⁴

在仁宗時代，士大夫讀書風氣極盛，為前代所少見，那真是北宋的黃金歲月。宋綬先前任翰林侍讀學士，為侍從之臣，於天聖元年（1023）同修真宗實錄；五年，同修太祖、太宗、真宗三朝國史，皆告完成。於明道二年（1033）十月除參知政事，時宰相呂夷簡以綬明習朝章國典，遂令其編修《中書總例》，至景祐二年（1035）九月編成奏進，有四百一十九冊之多，可謂皇皇巨帙。仁宗下詔獎諭。呂夷簡就很自誇地說：「自吾有此例，使一庸夫執之，皆可為宰相矣！」¹⁵其有助於實際依法行政，管理各部寺監例行公務之運作，綬身為參知政事，富有行政經驗，所編集的資料，必是既有條理又切實用的。綬同時又兼同修國朝會要，雖《慶曆國朝會要》之成書是在綬逝世之後，但綬仍是有貢獻的。綬在景祐四年（1037）四月罷參政，至康定元年（1040）三月授任知樞密院事，九月，又拜參知政事，至十二月便病逝了。史稱其「性孝謹清介，言動有常，……博通經史百家之書，文章為一時所尚，朝廷有大議論，多所裁

13 畢仲游，《西臺集》（叢書集成新編本），卷13，〈判西京國子監宋公墓誌銘〉。

14 朱弁，《曲洧舊聞》（知不足齋叢書本），卷4。

15 李燾，《續資治通鑑長編》（世界書局影印本，以下簡稱《長編》），卷117。

定。」¹⁶是極稱美的。從他參與纂修史書之事實看，他確是一位史學家。後來敏求亦奉詔修史書，所謂家傳史學，子承父業，正如西漢之司馬談、遷父子，東漢之班彪、固父子，是為士大夫所稱羨的。敏求的至友蘇頌就指出此一事實：

在昔官以世稱，而其事實見於後者，獨史氏之載籍存焉！司馬遷論著先人所次舊聞，班固奉詔續父所撰前記，皆因其緒業，卒成大典。後之言官守者稱之，談世家者善焉！國朝史官無常員，惟時撰錄所寄，尤艱其選。而宋氏二公載世典領其職。起建隆訖天禧，述祖宗創制致治之美，洎真宗一朝實錄，時則尚書令燕國宣獻公預焉！自乾興至治平，敘二帝成功盛德之事，洎仁宗一朝實錄，時則貳卿龍圖常山公繼焉！五朝正史，二聖編年，出於一門父子手筆，可謂家世之盛矣！傳曰：信哉！其能成名也。其常山公之謂乎！¹⁷

宋綬、敏求父子皆曾任國史院同修國史及實錄院同修撰，再升修國史，為士大夫所崇敬。綬次子敏修字中道，曾任秘書丞，篤志學問，能傳家學，著有《春秋列國類纂》。¹⁸敏求的長子慶曾，則是「平居惟家學之為嗜，雖一飲一食，未嘗忘其學，若不知也。」¹⁹敏求次子匪躬，曾任秘書省正字，元祐七年（1092）正月，轉秘閣校理。²⁰匪躬纂有《館閣錄》十一卷，起自太平興國，訖於元祐中，載館閣故事，分為八門，原為十五卷，淳熙四年（1177）編《中興館閣書目》時只存十一卷。²¹二人都能承繼家學，只是很不幸地，在元符年間家中發生火災，五世百年藏書，化為灰燼，所以到敏求的曾孫輩就不易承繼家學。但在宋室南渡後，敏求的後人仍編輯《宋朝大詔令集》二百四十卷，起建隆訖政宣，為北

16 《長編》，卷129。

17 《蘇魏公集》，卷51，〈龍圖閣直學修國史宋公神道碑〉。

18 敏修著作見徐松輯，《宋會要輯稿》（新文豐出版公司影印本），〈選舉〉31之6。又王安石，《臨川集》（四部叢刊本），卷35，〈宋中道挽辭〉云：「文史傳家學，聲名動帝除。……」

19 同註13。

20 《宋會要輯稿》，〈選舉〉33之18。

21 王應麟，《玉海》（大化書局影印合璧本），卷165，《中興館閣書目》。

宋王言的淵海。²²

敏求字次道，生於真宗天禧三年（1019），七歲，便以父蔭為秘書省正字，至十歲即能承家學。寶元二年（1039），召試學士院，賜進士出身。次年丁父憂，服除，始召授校書郎，充館閣校勘。慶曆五年（1045），王堯臣、宋祁奉詔刊修《唐書》，以敏求熟習唐代故事，乃薦他任編修官。皇祐元年（1049）春，往潁州探望舅氏，拜見知州歐陽修，相聚數日，極為相得，及辭歸京師，修乃為文以送之。其文云：

廣平宋君，宣獻公之子。公以文章為當世宗師，顯於朝廷，登於輔弼，清德著於一時，令名垂於後世。君少自立，不以門地驕於人，既長，學門好古為文章，天下賢士大夫皆稱慕其為人。日與寒士往來，而從先生國子講論道德，以來其益。夫生而不溺其習，此蓋出於天性；其見焉而不動於中者，由性之明學之而後至也。……余自其幼見其長，行而不倦，久而愈篤，可知其將無所不至焉也。……予陋巷之士也，遭時奮身，竊位於朝，守其貧賤之節，其臨利害禍福之際，常恐其奪也。以予行君子之所易者猶若是，知君行聖賢之所難者為難能也。歲之三月，來自京師，拜其舅氏，予得延之南齋，聽其議論而慕其為人，雖與之終身久處而不厭也。²³

這不是一般的應酬文字，以當時歐陽修在政學界的泰斗地位，如此的推崇敏求，足以說明敏求的學行是高人一等的。所以在至和元年（1054）歐陽修奉詔刊修唐書後，便常向敏求訪問唐代史事，並薦敏求同知太常禮院，再遷太常博士、集賢校理，仍任編修官。至《唐書》修成，修書官皆進秩，得遷工部員外郎。嘉祐六年，轉刑部員外郎，出任三司度支判官。次年，出知亳州。一年後，仁宗崩殂，也詔修仁宗實錄，治平元年（1064）被召回京，任實錄院檢討官。後升為工部郎中同修撰，兼知制誥同修起居注。熙寧二年（1069），《仁宗實錄》修成，乃拜諫議大

22 陳振孫，《直齋書錄解題》（四庫全書本），卷5云：「《本朝大詔令》二百四十卷。實謨閣直學士豫章李大異伯珍刻於建寧。云：紹興間，宋宣獻公家子孫所編纂也，而不著其名。始自國初，迄於政宣，分門別類，凡目至為詳悉。」大致依循《唐大詔令集》。

23 歐陽修，《歐陽文忠公集》（四部叢刊本），卷43，〈送秘書丞宋君歸太學序〉。

夫。不久，司馬光請修皇朝百官公卿表，又命敏求任同修。四年，任同判太常寺，編修閣門儀制。八年，特拜龍圖閣直學士。十年，詔修仁宗、英宗兩朝國史，敏求任修國史，又兼宗正寺修玉牒官。不幸於元豐二年（1079）四月病逝，享年六十一，至五年六月，《兩朝國史》修成進御，敏求家也得到銀絹的恩賜。

三、史學貢獻

前述宋敏求生長於文獻世家，藏書之富為北宋士族之冠，這是他一生的重要資產。宋朝去唐不遠，其家庋藏的唐代的文獻極為豐富，只要稍加彙輯，即可成為一專書。所以為了綜論敏求史學貢獻方便起見，特先逐一敘述他所編纂的史書，然後再加以分析。

（一）《唐大詔令集》——本書原是宋綬所彙編的，將唐代歷朝君主所頒降的冊文、德音、官誥、封贈、褒獎、貶責等官文書，輯成一編。尚未分類，綬突發病逝。敏求珍藏很久，至熙寧三年（1070）始編定卷次，釐為十三類，合一百三十卷。始於帝王、皇后、妃嬪，終以典禮、政事、蕃夷，每類下各分子目，如政事類便居六十七卷，其下分目甚細，乃全書的重點。歐陽修《新唐書》不載詔令，此書正可以補其缺。紀昀在《四庫提要》中雖指出本書若干疏略和不可解之處，但仍說：「唐有天下三百年，號令文章燦然明備，敏求父子復為哀輯編類，使一代高文典冊，眉列掌示，頗足以資考據。……唐朝實錄今既無存，其詔誥命令之得以考見者，實藉有是書，亦可稱典故之淵海矣！」²⁴此言極為得實。

（二）唐末六朝實錄——蘇頌撰敏求的神道碑說：「唐自大中世，史記放絕，載祀不傳，公綴集所聞，續武、宣、懿、僖、昭、哀六朝實錄，總一百四十八卷。」但據趙弁《郡齋讀書後志》卷一所載唐《武宗實錄》一卷，唐韋保衡等撰，《崇文總目》所著錄者，僅為一卷，乃會昌元年（841）正月及二月之紀事，以下皆亡佚。並說：「國朝宋敏求

24 紀昀，《四庫全書總目提要》（台灣商務印書館影印武英殿本），卷55。

次道嘗補《宣宗實錄》三十卷，《懿宗實錄》三十卷，《僖宗實錄》三十卷，《昭宗實錄》三十卷，《哀宗實錄》八卷，通百二十八卷，世服其精博。」未言及敏求修《武宗實錄》之事。不過《玉海》卻載：「唐《武宗實錄》二十卷，皇朝宋敏求撰，起開成五年（840）正月，至會昌六年三月，凡七年。」又言：「宋敏求續成唐錄一百卷，慶曆五年王堯臣上之，九月癸巳，以敏求為館閣校勘。」²⁵當時王堯臣正負責刊修唐書，敏求所補修的唐六朝實錄，對朝廷重修唐書很有幫助，神宗時司馬光奉詔修《資治通鑑》，范祖禹助其修唐代長編，於唐末六帝之史亦多用敏求所補撰之六朝實錄。

（三）《新唐書》——五代後晉宰相劉昫，史官張昭遠所修的《唐書》，善惡不分，忠奸不明，邪正不辨，難以彰顯史書中的義理。宋朝開國已八十多年，時空已完全改變，君臣咸以為當重新看唐代史事，有意修一部新書以取代舊著。先是慶曆四年（1044），賈昌朝建議修唐書，始令在史館秘閣供職的學士每人供《唐書》以外故事二件，令曾公亮等彙整之，有傳者附於本傳之後。一年後，史事增多，乃請下詔重修唐書。旋詔以「尚書度支員外郎集賢校理兼天章閣侍講史館檢討曾公亮、宗正丞崇文院檢討兼天章閣侍講趙師民、殿中丞集校理何中立、秘書省秘書郎宋敏求、大理寺丞館閣校理范鎮，並為編修唐書官。」前述敏求以補修唐武宗以下六朝實錄，遂遷為館閣校勘，以後在書局十多年，貢獻良多。據歐陽修自言：「檢會宋祁、范鎮到局各及十七年，王疇一十五年，宋敏求、呂夏卿、劉義叟並各十年以上，內列傳一百五十卷，更是宋祁一面刊修，一部書中，三分居二。范鎮、王疇、呂夏卿、劉義叟並從初置局便編纂故事，分成卷草，用功最多。」所以歐陽修在嘉祐五年六月修成《唐書》奏進後推恩加秩時，即奏言到局最晚，只修成紀志六十卷，如一例受賞，實有愧心。據敏求的記載，劉義叟修天文、曆志，梅堯臣修方鎮、百官表，歐、宋、范、王及敏求皆各遷一官，呂除直秘閣，劉為崇文院檢討，堯臣在一月多前去世，詔官其一子。²⁶此處雖未言明敏

25 《玉海》，卷48，〈唐武宗實錄〉及〈宋朝續唐錄〉條。

26 宋敏求，《春明退朝錄》（百川學海本），卷下；及《歐陽文忠公集》，卷91，〈辭轉

求所負責修撰的志表傳為何，但他熟於典章儀制，而在局時間亦不止十年以上，即使在慶曆六年敏求於祖母楊氏逝世後以嫡孫承重，請求去位時，仍詔修書於家。此後除在自皇祐三年（1051）三月至至和元年（1054）八月的四年間曾外任不計，則其在書局的時間也有十三年。仁宗所賜獎賞增秩詔有云：「歐陽修、宋祁創立統紀，裁成大體；范鎮、王疇、宋敏求等網羅遺逸，厥協異同，凡十有七年，大典乃立，閎富精覈，度越諸子矣！……皆增秩一等，布其書於天下，使學者咸觀焉！」²⁷能網羅遺逸，使新修的《唐書》能夠閎富精覈，其貢獻自亦不細。

（四）《仁宗實錄》——嘉祐八年三月，仁宗崩，英宗即位，至十二月，即詔修《仁宗實錄》，命翰林學士王珪、賈黯、范鎮為修撰，直秘閣呂夏卿、秘閣校理韓維及敏求充檢討官，時敏求正知亳州，特召還用之。治平元年二月，宰相韓琦任提舉，不久敏求遷知制誥同修起居注，兼同修實錄。至熙寧二年（1069）七月實錄修成進御，凡二百卷，敏求始終其事，貢獻良多。陳振孫說：「《仁宗實錄》二百卷，學士華陽王珪禹玉、范鎮景仁，知制誥常山宋敏求次道撰。嘉祐八年奉詔，歷治平，至熙寧二年七月書成，宰相韓琦提舉。」²⁸朝廷獎其勞，拜右諫議大夫。

（五）仁宗、英宗《兩朝國史》——熙寧十年五月，詔修仁宗、英宗兩朝正史，命宰相吳充提舉，敏求以龍圖閣直學士右諫議大夫為修史，秘書監集賢院學士蘇頌為同修史，秘書丞集賢校理王存、太子中允集賢校理崇政殿說書黃履、著作佐郎集賢校理林希並為編修官。七月，修成帝紀草奏呈，由敏求進讀，神宗起立恭聽，顧問再三，至讀畢始坐。當時敏求正修皇朝百官公卿表，編修官黃履並不知情，乃於十月上奏稱：「又紀傳雖備，並未有表，今既修之，恐不可無也。」有詔立表不行，諸志接續太祖至真宗《三朝國史》。元豐三年（1079）四月敏求病逝，《兩朝國史》尚未成書，至五年六月始修成二百卷（紀五卷、志四十五卷、列傳一百五十卷），由監修王珪投進，修書官各賜銀絹有差，

禮部侍郎劄子）。

27 《直齋書錄解題》，卷4，〈新唐書〉。

28 《直齋書錄解題》，卷4，〈仁宗實錄〉。

敏求家亦獲受一百五十兩疋之賜。²⁹

(六)《閣門儀制》——熙寧二年四月，敏求奉詔編修閣門儀制，取唐宣政殿儀制裁定。次年五月，敏求上奏：「奉詔重修定閣門儀制內文德殿入閣儀，……案今文德殿，唐宣政殿也；紫宸殿，唐紫宸殿也。然祖宗朝，皆曾御文德殿入閣。唐制：常設仗衛於宣德殿，或遇只坐紫宸，即喚仗入閣。如此，則當御紫宸入閣，方協舊制。」因翰林學士王珪持異議，未被採納。繼而敏求又上奏：「本朝以來，惟入閣乃御文德殿視朝，今既不用入閣儀，即文德殿遂闕視朝之禮，請下兩制及太常禮院，約唐制御宣政殿，裁定朔望御文德殿儀，以備正衙視朝之制。」由翰林學士韓維議定入閣儀制，並上合班圖，修入《閣門儀制》中，七年八月編成，裝為十冊，即以奏御。³⁰

(七)《朝會儀》、《令式》——此二書不見於《宋史·藝文志》，《禮志》則載之：「元豐元年，詔龍圖閣直學士館修撰宋敏求等詳定正殿儀注。敏求遂上《朝會儀》二篇，《令式》四十篇。詔頒行之。」同詳定者尚有蔡確、李清臣，其元正冬至大朝會儀注詳載於馬端臨《文獻通考》中。³¹

(八)《蕃夷朝貢錄》——《宋史·藝文志》著錄敏求著《朝貢錄》二十卷，列入〈故事類〉中。《郡齋讀書志》及《直齋書錄解題》皆未收錄，惟《玉海》中則載之。其〈朝貢門〉云：「熙寧四年十月六日，樞密都承旨李評請諸國朝貢另置一司領之，取索文字，預為法式。詔頒於客省。七年九月丁未，史臣宋敏求等上《蕃夷朝貢錄》二十一卷，即李評所請也。」³²乃奉詔編修之書，以備有蕃夷來朝貢時依此法式行事。

(九)《東京記》、《長安志》及《河南志》——據蘇頌所撰敏求

29 《長編》，卷282、283，285及327。

30 《宋會要輯稿》，〈儀制〉，1之28-30；《宋史》，卷117，〈入閣儀〉；《玉海》，卷69，〈熙寧閣門儀制〉。蘇頌撰敏求神道碑稱《閣門儀制》十三卷，《例要》五卷。其合班圖載在馬端臨，《文獻通考》（商務印書館影印十通本），卷108，〈朝儀〉中。

31 《宋史》，卷116，〈大朝會儀〉，於本段敘事後並附其制。又《通考》，卷108，將篇作卷。

32 《玉海》，卷153，又見《長編》，卷227及256。

神道碑記載：「國朝都汴，沿舊方鎮，府寺邸第，閭里坊巷，增易數矣，人罕知其故處者，公依韋述類例，撰《東京記》三卷。雍洛故京，漢唐遺事，漸羅殘燬，其跡熄矣，公掇方志泊碑記所載，撰《長安》（志）、《河南志》各二十卷。」這三種書今只有《長安志》獨存。由於長安是漢唐的故都，古蹟最多，記載實繁，博採群籍，網羅軼聞，搜訪古蹟，歷二十多年始完成。熙寧九年趙彥若為之序，稱其「窮傳記諸子鈔類之語，絕編斷簡，靡不總萃，隱括而究極之，上下浹通。」清儒畢沅在乾隆四十九年（1784）巡撫陝西，乃校刻此書，將畢工，特請王鳴盛撰一序文冠於前，極稱揚「宋氏此編綱條明析，贍而不穢，可云具體。」³³所言皆得其實。本書卷一分八目，略述歷代沿革而及於宋，卷二分四目，述雍州、京都、京兆尹及府縣官，卷三至六述周、漢、唐之宮室，卷七至十專載唐代京城，卷十一以下分述京兆府所管各縣，極為詳贍。故畢沅常在校記證以它書，證明此書記載精詳。其次為《南志》，今雖不存，然司馬光《溫公集》中載有序文一篇，據云：「唐麗正殿直學士韋述為《兩京記》，近故龍圖閣直學士宋君敏求字次道演之為《河南》（志）、《長安志》，凡其廢興遷徙及宮室、城郭、坊市、第舍、縣鎮、鄉里、山川、津梁、亭驛、廟寺、陵墓之名數，與古先之遺蹟，人物之俊秀，守令之良能，花卉之殊尤，無不備載。考諸韋《記》，其詳不啻十餘倍，開編粲然，如指諸掌，其博物之書也。」³⁴這篇序文撰於元豐六年（1083）二月，敏求已逝世四年了，當時文彥博正任西京（河南府）留守，敏求長子慶曾來到洛陽，特向彥博請求刻印此書，得到他的允從，適巧司馬光在洛陽修《資治通鑑》，彥博乃以撰序文相請，而光與敏求先前也曾一同修《皇朝百官公卿表》，乃志同道合的朋友，義不容「以固陋而辭。」序文所言其內容至為真實。當清光緒初年，繆荃孫於友人處獲觀《河南志》一巨冊，乃為清徐松自《永樂大典》中輯出者，其封題手筆仍可辨識。所記「城池、宮闕自周至唐悉具，知為宋次道《河南志》之首冊，

33 宋敏求，《長安志》（宋元方志叢書本），卷首。

34 司馬光，《司馬溫國文公集》（四部叢刊本），卷65，《河南志序》。

後分作四卷，刻入《藕香零拾叢書》中。」³⁵細閱之，內中記事至北宋者亦復不少。至於《東京記》，久已散佚，陳振孫曾藏有之，記其內容為：「上卷為皇城，周五里，唐時宣武節度使治所。建隆三年，廣城之北隅，用洛陽宮殿之制修之。中卷為舊城，周二十一里一百五十步，唐汴州城也，號闕城，亦曰裏城，周四十八里二百三十三步，周世宗所築羅城也，號曰國城，又曰外城。三城之內，宮殿、官府、坊巷、第宅、寺觀、營房、次第記之。」³⁶此記卷帙雖不多，但京師建築的規模都已具體呈現了。

除了上列之專著外，尚有一些奉敕編纂和私自編集之書並未列入，司馬光謂：「專修未成者皆不計外，其手自纂述已成者凡四百五十卷，蓋昔人未有若此其多也。」有些著作早已散佚，各家書目亦未見著錄，難以究知，蘇頌在所撰的敏求神道碑中，則有簡明扼要的敘述：

記當官所聞見與其應用則有《三川下官錄》、《入蕃錄》、《春明退朝錄》各二卷，《韻類宗室名》三卷，《元會故事》一卷，撫唐人物世系遺事則有《諱行後錄》五卷，……復采唐人詩歌見於石者作《寶刻叢章》三十卷。嘗謂司馬遷《史記》注解疏梧，學者罕通其義訓，悉取音義、索隱、正義，王元感、陳伯宣別注，將仿顏詩古西漢為集注。及被詔修百官表、續本朝會要、刪定《九域志》，皆未克就。嗚呼！可謂博矣！

此段碑文說明了敏求一生一直從事史學研究及史書編纂工作，不幸只享壽六十有一，如天假以年，其成就實未可量。綜其史學貢獻可歸納為三項：

甲、藏書家將其珍藏的重要文獻編輯成書，公之於世，對以後的史學研究與史書編修，其有形和無形的貢獻是不可計量的。如敏求補修唐武宗以下六朝實錄，對於仁宗時詔修唐書在史料的搜集方面幫助極大，而他又在修唐書書局任編修達十三年之久，當時參與修《新唐書》的史官都很推重他。因為《新唐書》中不載詔令制誥，則敏求所輯成的《唐大詔令集》便極有貢獻。他充分利用家藏之典籍，又輯唐顏真卿《顏魯

35 徐松，《河南志》（宋元方志叢書本），繆荃孫跋文。

36 《直齋書錄解題》，卷8。

公集》十五卷，孟郊《孟東野集》十卷，李德裕《李衛公別集》五卷，李白《李翰林集》三十卷，劉禹錫《劉賓客外集》十卷，這些唐代名家文集能夠傳於後世，全靠敏求之輯錄成專書，其功確是不可沒的。

乙、隨著時代的進步，官私記載的與日俱增，再加上古物的出土，於是史書的纂修乃不斷地推陳出新，進而影響後世編修史書的風尚。帝王所頒佈的命令，在《新唐書·藝文志》中，特立〈詔令〉一目，列入〈起居注類〉中，如不著編人的《唐德音錄》也僅三十卷，而敏求父子所輯的《唐大詔令集》則多達一百三十卷，此後彙編一代詔旨、制誥、德音成一專書，漸成新風氣。敏求的後人首先在紹興初年編成《宋大詔令集》。同時人林慮編《西漢詔令》、樓昉編《東漢詔令》，汪藻編《元符庚辰以來詔旨》，洪遵編《中興玉堂制草》，無疑都是繼敏求的書而作。在君主專制時代，詔敕就是法令，由此亦可觀一代政治風俗之美惡。至於地方志書的纂修，敏求的《長安志》、《河南志》及《東京記》，雖偏重古蹟、建置、坊巷，然就專記一地而言，確已加詳。宋室南渡後，修地方志已成地方官、學士大夫及鄉紳所共同關注之事，降及元明，沿襲成風，地方長貳咸視修志是前政留給後政的最寶貴之資產。敏求曾任河南府通判，熟究本府掌故和建置沿革，乃修《河南志》二十卷，今雖不傳，但其開新風氣則是不容否定的。

丙、宋代史家重視當代史之纂修，身為史官者，奉詔編修國史、實錄、會要，乃其職分。前述敏求任實錄院同撰修成《仁宗實錄》，以制誥兼同修國史時修《兩朝國史》。朝廷又以其熟習禮制，令修《閣門儀制》、《朝會儀》等書。在熙寧二年（1069）十一月，翰林學士史館修撰司馬光奏請：「欲據正史，實錄所載，旁採異聞，敘宋興以來迄今百官沿革，公卿除拜，仿《漢書》舊法，作大宋百官公卿表，以備奏御便省覽。」³⁷神宗允從。光又特薦敏求同修，至元豐二年四月敏求病逝時尚未成書，繼任者為趙彥若，兩年後成書十五卷。自建隆元年，迄治平四年，凡文臣、武臣和內官皆分別立表。因為司馬光因反對王安石變法，奉祠，遷居洛陽，專心編修《資治通鑑》，則修百官公卿表之責便完全

37 《玉海》，卷119，〈熙寧百官公卿表〉。

由敏求承擔，前後任職十年，必有相當的貢獻。書成後，藏於編修國史院，世所知者甚少。只有在史館任職的士大夫抄得此書藏於家，或者輾轉借抄，未必為完帙。南宋史家李燾自稱家藏一部殘本，乃以此為基礎，並加增補、續編，止於宣和之末，乃增至一百四十二卷。³⁸而且李燾和徐夢莘、李心傳都是編修當代史的名家，正是承繼北宋史家的傳統。

四、結 論

綜上所述，宋敏求生長於仕宦之家，家中藏書特富，在仁宗時代便已享有盛名，他善為文章，明習典禮，博物洽聞，有長者之行，是時賢所公認的。當熙寧三年四月，王安石欲用李定為御史，敏求以定由軍事推官逕除御史，不合舊制，不肯草制，因此得罪安石，乃遭罷知制誥之處分。其後安石去位，敏求並未上疏攻擊安石，誠不失為長者之行。敏求逝世後，士大夫致輓章、祭文者多達六十三人，其子慶曾於元豐八年乃編集贈誥、碑銘、行狀、祭文和哀輓之章，凡一百九十五篇，名曰《褒賢集》，由畢仲游撰序文一篇勉宋氏後人紹繼。由此可見士大夫對敏求的敬重，仲游稱美其明是非、守大體，有古節士之風，也並非一己之私言。茲再引曾鞏的祭文以助說明：

公之於古今典章沿革，得之於心，山藏海積；又於舊聞隱顯纖悉析之以口，天高日白。公在朝廷，群公百司解惑釋疑，公為著龜；公在太史，維僚與屬正繆辨訛，公為耳目。今公亡矣！廷有大議，問故事者眾失其歸；國有大典，考前載者人失其師。況公行不絕俗，而動有常度，言不忤物，而辭無可疵。……至於篤友尚舊，比義親仁，追往烈而競逐，豈庸態之能鄰？然而早蹈屬於儒館，晚委蛇於從臣，曾未得歷禁林之獻納，任廊廟之彌綸。何鸞儀而鵠峙，忽飄逝而星淪！哭公之喪者，客不絕於門庭；公薨亡而集賢，蓋旁羅而遠屬。至於帝宅神州，祖功宗德，咸在筆削，具存方冊。爭日月之

38 《文獻通考》，卷202，〈經籍考〉二十九，引李燾序文。

光輝，與天地而終極！³⁹

曾鞏的祭文，正可代表當時賢士大夫對敏求高尚品德和史學貢獻的崇敬，儒者不在於享高官厚祿，而在於能留不朽之英名，一生貢獻於史書之編修，為後世留下信史，做一位偉大的史學家，如孔子修《春秋》、司馬遷修《史記》一樣，能立言也是不朽的。

（責任編輯：周敘琪 校對：廖宜方 郭恩秀）

39 曾鞏，《元豐類稿》（四部叢刊本），卷38，〈祭宋龍圖文〉，又見《永樂大典》（大化書局影印本），卷14046。

The Life of Song Minqiu and His Historical Writings

Wang, Teh-yi*

Abstract

Succeeding his father, Song Shou, as the chief editor of the *Guoshi* and *Shih-lu* of the Song Dynasty, Song Minqiu was one of the best historians during the period of Northern Song. Song Minqiu was very devoted to ancient learning when he was young. Though a man of noble birth, Song was always modest and unassuming. He had very good reputation in the intellectual circle, and received high praise from Ouyang Xiu. With a good collection of historical sources on the Tang Dynasty, Song finished the edition of *Tang Ta Zhaolin ji*, a work that had been started by his father. And he tried to complete the *Shilu* of the late Tang Dynasty. Song Minqiu was later appointed as chief editor of *Tang Shu* by Emperor Song Zhengzong. Henceforth, he worked closely with Ouyang Xiu. After the accession of Song Yinzong, he was commissioned to write the *Shilu* of Song Zhengzong. In 1096, Song Minqiu was recommended by Sima Guang to work on *Huangchao Baiguang Gongqing Biao*. Eight years later he was appointed by the emperor editor-in-chief of *Liangzhao Guoshi*. When he died in 1079, both *Huangchao Baiguang Gongqing Biao* and *Liangzhao Guoshi* were unfinished: they were published after another two years.

The voluminous works of Song Minqiu include *Gomen Yizhu*, *Fang-gao Zhaogong Tiaoli*, *Fanyi Zhaogong Lu*, *Yuan Zhengzhao Heyi Zhu*, etc. He was especially good at legal history and the study of official institutions. And, he was a geographer as well; his *Dongjing Ji*, and *Henan Ji* provided detailed information on the capitals of the Han, Tang and Song Dynasties. *Sanchuang Xiguang Lu*, *Rufan Lu* and *Chunmin Tuichao Lu* were the memories of his official life. These include important data for the study of the Song Dynasty. Song Minqiu was also co-editor of *Xu Guozhao Huiyao* and *Yuanfeng Jiucheng Zhi*. He was a great scholar whose works were comparable with the very best.

Keywords: *Guoshi*, *Shilu*, historical study, institutions, legal system.

* Emeritus Professor of History,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.